

经济、网络与公共空间

——珠三角劳力移民的个案研究

陈世明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

参加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华南的移民
与城市化——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邮寄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马丁堂

电子邮箱：897149926@qq. com

电话：13430340987

推荐人姓名：周大鸣

推荐人邮箱：Email：hsszdm@mail. sysu. edu. cn

【摘要】城市新移民指的是智力型移民、经营型移民和劳力型移民三类群体。本文以东莞大宁社区的劳力型移民为例，描述其生计、社会网络与公共空间，试图从这三个维度探讨城市新移民的生存景观。本文基于珠三角乡村都市化与人口流动的宏观背景，通过个案的形式呈现城市新移民社区的形成与日常生活。出租屋社区的小店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交换与生计来源，还是社区的公共空间，社区互动在这里发生，社区网络得到延伸，社区共同体得以形成。城市新移民的社会网络不再局限于亲缘关系，不同地域群体在这一公共空间进行互动与生存。随着新型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迈向移民城市已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城市新移民社区将会进一步形成、延续与发展。

关键词：

经济；社会网络；公共空间；城市新移民

推荐信

UCRN2016 年年会大会组委会：

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陈世明提交的《经济、网络与公共空间 —— 珠三角劳力型移民的个案研究》，以东莞大宁社区的劳力型移民为例，描述其生计、社会网络与公共空间，试图从这三个维度探讨城市新移民的生存景观。本文基于珠三角乡村都市化与人口流动的宏观背景，通过个案的形式呈现城市新移民社区的形成与日常生活。文章指出，随着新型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迈向移民城市已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城市新移民社区将会进一步形成、延续与发展。

陈世明是在我指导下的一名博士研究生，平时认真钻研学术，积极参与理论探讨，是一名优秀的学生。因此，我十分乐意推荐他参加此次会议论文的竞选活动。

如果他的论文入选，我承诺我们的机构将会提供他的往返交通费用。

谢谢！

推荐人：周大鸣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一、作为社会现实与学术话语的城市新移民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日益提升。尤其是到 2011 年底成为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在这一年，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¹在东部沿海地区，大量的乡村从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社区的乡村都市化历程。“十二五”时期，我国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约 800 万人，2014 年年末达到 2.53 亿人。根据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和城乡人口变动趋势预测，到 2020 年，我国流动迁移人口（含预测期在城镇落户的人口）将逐步增长到 2.91 亿，年均增长 600 万人左右，其中，农业转移人口约 2.2 亿人，城城之间流动人口约 7000 万人。²2013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6894 万人，比上年增加 633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6610 万人。³2014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7395 万人，比上年增加 501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6821 万人。⁴

在上世纪 50 年代自改革开放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格控制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当时主要的途径是考大学、当兵、成为干部等。在 50 年代，农民工一词是由“盲流”所替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东部沿海城市的城市化发展带动了农村人口的流动。此时，“打工妹”、“打工仔”⁵成为本地人对他们的称呼，意味着将他们看做是来城市里打工的人，通过打工挣钱寄回农村的家人使用，他们并不是长久都会居住在城市，城市只是他们挣钱的驿站。自九十年代以来，“农民工”一词逐渐成为学界、社会媒体对于那些来自农村并且在进入城市里从事体力活的人的一个称呼，因为户籍制度的原因，他们即使是在工厂打工也依旧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最近几年，“农民工”的称

¹ 2011 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为 134735 万人，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资料来源：《2011 年中国大陆城镇人口数量首超农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01/17/c_111445280.htm，2015 年 11 月 1 日访问。

² 《11 月例行发布会材料：，〈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5〉有关情况》，来源：<http://www.nhfpc.gov.cn/xcs/s3574/201511/07b8efe0246e4a59bd45d1fd7f4e3354.shtml>。2015 年 11 月 24 日访问。

³ 《2013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来源：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zwgk/szrs/ndtjsj/tjgb/201405/t20140529_131147.htm，2015 年 11 月 1 日访问。

⁴ 《2014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来源：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dongtaixinwen/buneiyaowen/201505/t20150528_162040.htm，2015 年 11 月 1 日访问。

⁵ 当时主要形容那些未结婚的农村男女青年，多为 18-25 岁左右。

呼越来越受到批评，不少地方政府都提出取消农民工的称呼。⁶顺应时代的发展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需要，“城市新移民”的提出成为社会的共识。不少城市都根据实际情况，赋予这些流动人口不同的名称。广州将非广州户籍的人成为来穗人员，并且在2014年成立了广州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全国副省级省会城市中首个设立外来人员服务管理局的城市。⁷而早在2008年，东莞成立新莞人服务管理局，成为全国首个地级市流动人口专职服务管理机构；在2007年，东莞市“两会”期间，“外来工政协委员”房智平提交了《建议东莞市政府公文取消“外来工”这一称谓》的提案，同年4月，东莞市从46种备选称谓中，确定“新莞人”为东莞1000多万非户籍工作人员的称谓，此后东莞市各级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发布的正式公文中，用“新莞人”指称广大外来人口，不再出现“外来工”字眼。⁸在2010年，东莞市开始实施新莞人积分入户政策。⁹从这些机构的设立和名称的改变，可以明显地看到，政府对于外来人口的态度逐步由管理到服务转变，也越来越接受“城市新移民”的内涵与意义。

学界上，对于农民工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而从城市新移民的角度来分析的则相对薄弱。”以“城市新移民”为题名，在中国知网上的搜索结果为158条，其中包括核心期刊论文、硕博士论文和报纸文章；以“城市新移民”关键词，共有70条搜索结果。而以“农民工”为提名，则73000多条搜索结果，光是2015年都超过3000条。¹⁰

在反思二十多年农民工研究的经验和路径后，不少学者开始提出“城市新移民”的研究视角，他们将城市新移民视为一个整体的、多样化的移民群体。我国移民研究的新思路在于以城市新移民概念为核心，摆脱城市——农村二元对立的思维，将移民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方式来看待，重点关注城市新移民通过社会融合

⁶ 《中国有意取消“农民工”称谓 广东河南率先提出》，来源：

<http://news.sohu.com/20120104/n331156616.shtml>，2015年11月1日访问。

⁷ 《广州设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来源：http://m.dayoo.com/127909/127913/201403/07/127913_35361502.htm；
《广州成立来穗人员服务管理》，来源：<http://gd.people.com.cn/n/2014/0129/c123932-20496064.html>，2015年11月1日访问。

⁸ 新莞人服务管理局的主要职能有六项，分别是统筹全市新莞人和出租房屋服务管理工作；规划和建立健全新莞人服务、培训体系，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做好新莞人的服务、培训和维权工作；收集、登记、统计和分析全市新莞人有关信息；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出租房屋税收征管、暂住证发放等。参考《新莞人服务管理局昨晚挂牌》，来源：<http://news.sina.com.cn/c/2008-11-07/024714690772s.shtml>，2015年11月1日访问。

⁹ 《东莞启动新莞人入户积分制度》，来源：

http://www.sun0769.com/subject/2010/e_conference/5/t20101230_964923.shtml，2015年11月1日访问。

¹⁰ 截止到2015年11月1日数据，不排除会有一些是重复出现的。

所引发的城市社会重构，从而带来城乡二元结构消解，最终实现城乡和谐社会的过程；“城市新移民”研究思路的转变对理解我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进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对策意义。¹¹在十多年前，不少人就开始提出要关注城市新移民。¹²文军认为，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了大规模的国内劳动力移民浪潮，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城市的“新移民”群体，这些新移民在一定意义上已构成了一个“移民系统”，并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上分别受制于制度政策、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的影响。¹³朱力指出，随着社会流动加快，我国城市社会群体的分层化已成明显趋势，以1亿进城务工人员为主体的城市新移民群体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赋予城市新移民平等发展机会。¹⁴景志铮、郭虹以社会排斥理论作为概念工具，从经济排斥、社会关系排斥和文化排斥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社会排斥是新移民社区融入的壁垒所在，缓解消除社会排斥，实现社区参与、社会交往的“破冰”，是形成社区内社会关系“互构共变”的基础，是城市新移民真正融入社区的前提。¹⁵外来新移民同城市社会的融合将依次经历“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同质认同”等三个阶段。在目前所处的“敦睦他者”阶段，城市政府应依托社区采取一系列促进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对策，同时自上而下地将各种机会、待遇、保障同城市本地户籍相剥离，以“化整为零”的方式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创造一个纯粹个人之间公平竞争的平台。¹⁶另外，张文宏和雷开春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及其现状进行研究，指出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包含着文化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经济融合。¹⁷除此之外，还有不同学者从其他方面进行研究，如对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与空间的研究¹⁸，对城市新移民社会权利保障的研究¹⁹。

对于外来人口如何在城市社区生存，建立经济与社会网络，已有不少学者进

¹¹ 周大鸣、杨小柳：《从农民工到城市新移民：一个概念、一种思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¹² 武晓黎：《关注城市新移民》，《党政干部文摘》2000年第01期；陈映芳：《关注城市新移民》，《解放日报》2004-08-22。

¹³ 文军：《论我国城市劳动力新移民的系统构成及其行为选择》，《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¹⁴ 朱力：《赋予城市新移民平等发展机会》，《南京日报》2006-01-26。

¹⁵ 景志铮、郭虹：《城市新移民的社区融入与社会排斥——成都市社区个案研究》，《西北人口》2007年第2期。

¹⁶ 童星、马西恒：《“敦睦他者”与“化整为零”——城市新移民的社区融合》，《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1期。

¹⁷ 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¹⁸ 李志刚、刘晔：《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网络空间分异》，《地理学报》2011年第6期。

¹⁹ 苏昕：《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新移民社会权利保障》，《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2期。

行讨论。农民工虽然流动到了城市里，但其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农民工的社会流动、社会支持、融入城市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无疑降低了他们的流动风险和成本；农民工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关系纽带，并使之成为其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²⁰李志刚等人通过对广州8个城中村的问卷调查与实证研究，发现新移民的社会网络表现为成分多样化、关系现代化和空间分散化等3大特征。²¹张鹂以北京浙江村的企业主为研究对象，探讨农村流动人口怎样结成新的社会网络并塑造属于他们的社会空间和民间领导层，她认为流动人口群体中出现一种新型的权力和领导权，主要通过外地人社区的空间、社会关系的建构得以实现，产生一种非正式的庇护关系。²²社区的公共空间与社区参与密切相关，阿兰纳·伯兰德和朱健刚基于广州两个社区的研究，指出绿色社区建设不仅带来社区环境的变化，而且其整个创制过程帮助重组了社区的公共空间。²³

基于已有的研究，本文试图从经济（生计）、社会网络、公共空间三个维度来描述与分析城市新移民的生存状况。首先，本文采用已有研究对城市新移民的分类，指的是智力型移民、经营型移民和体力型移民三类群体。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多为定量的研究或者是对城市新移民社区融合的分析，较少从普通的城市新移民（指的是以体力劳动为主、收入较低、处在社会底层的新移民）的角度来探讨移民社区的维系。本文以东莞大宁社区的劳力型移民为例，描述其生计、社会网络与公共空间，试图从这三个维度探讨城市新移民的生存景观。本文基于珠三角乡村都市化与人口流动的宏观背景，通过个案的形式呈现城市新移民社区的形成与日常生活。围绕着城市新移民的社区空间——“小店”，以小见大，将其看做是经济、网络与公共空间的复合体，从居住在出租屋里的城市新移民的日常生活——消费、娱乐、社会互动等——来描述与分析，试图理解出租屋社区形塑过程。

²⁰ 周大鸣、刘玉萍：《社会关系网络与农民工投资型输出——以佛山“攸县人”挖机经济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²¹ 李志刚、刘晔：《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网络空间分异》，《地理学报》2011年第6期。

²² 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袁长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²³ 阿兰纳·伯兰德、朱健刚：《公众参与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对绿色社区建设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二、乡村都市化视域下的新莞人社区

改革开放后，广东省对外经济呈现迅猛发展的态势，尤其是以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特别是以制造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城市，吸引了大量的省内外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珠三角的“三来一补”企业的异军突起，省内和省外的农村劳动力涌入珠三角地区，从1982年的11.5万到1988年形成第一次“民工潮”时的300万。根据《广东省志》的记载，在1980年以前，广东省际人口的迁移态势是迁出大于迁入，1982年后是迁入大于迁出，反映了广东改革开放以后对劳动力的吸引力；2000年，全省流动人口总规模已经超过3000万，来自省外人口为1506万，来自湖南、四川、广西、江西、湖北和河南等占82.8%，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1990年，珠三角有流动人口273.10万，占全省流动人口的82.39%，2000年时已经增至1929.34万，占91.64%，其中东莞的外来人口排在第二，为501万。²⁴ 在1986年，东莞外来暂住人口156222人，占11.27%，1990年，外来暂住人口655902人，占33.22%，2000年，外来暂住人口占到76.37%，与1990年相比，增长了10.19倍。²⁵ 2013年，东莞市常住人口831.66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88.93万人；城镇常住人口738.10万人，人口城镇化率为88.75%，是广东省第三大人口城市。²⁶

正如前文所说，东莞在2007年取消“农民工”从称呼，统称为“新莞人”，在2008年成立新莞人服务管理局，并且在2010年开始实施积分入户政策。另外，在2009年左右，在虎门等镇街试点新莞人新型社区建设，解决新莞人的落户服务管理问题。以虎门的民泰社区为例。2009年6月成立的民泰社区是新莞人聚集的新型社区，该社区负责办理符合政策规定的新莞人入户工作，协助有关部门服务管理入户居民的户籍、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子女就学、就业培训、义务兵役、民兵组织等。2013年，民泰社区有户籍人口2719人。²⁷

本文所要描述的新莞人群体生活在虎门大宁——虎门经济社会发展前列的

²⁴ 《广东省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1979-2000）·第1卷》，北京：方志出版社，2014年，第24页。

²⁵ 东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东莞市志（1979-2000）》，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6页。事实上，笔者查阅了《广东省志》等资料，发现具体的数据略有差异。

²⁶ 《东莞市统计年鉴2014》，来源：

<http://www.gd-info.gov.cn/books/dtree/showbook.jsp?stype=v&path=20291&siteid=dg&sitename=东莞市地情网>，2015年11月2日访问。

²⁷ 《虎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虎门年鉴2014》，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5页。

一个社区²⁸。位于虎门镇东南部，紧邻 358 省道和高深高速路的大宁村，在其约 5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有三个自然村——大宁、博投和江门村，分成六个村民小组——北坊、西坊、南坊、南门、博投和江门。本村村民约为 2800 人，城市新移民约有 2.5 万。这两万多的外来人口主要工作在大宁村 200 多家企业，其中包括 44 家外资企业。大宁村经济发展名列虎门乃至东莞前列，2013 年全村总收入超亿元，人均收入接近三万元。在 1979 年引进虎门第二家“三来一补”企业——大宁毛织厂后，大宁开始了乡村都市化的快速发展之道。根据村干部和村民的回忆，在八十年代初，大宁工厂内打工的多为本村村民，农闲在工厂打工，农忙则请假在田里忙碌农活，当时大宁主要种植水草、水稻和蔬菜等。为了解决农田和工厂争劳动力的问题，当时的村支书带领村干部，将全村的大部分田地该种香蕉，后来又开挖鱼塘，承包给本村村民或者浙江人养鱼和放鸭子²⁹。自 1979 年至今，大宁村的地理范围基本保持现状，村集体管理体制经历多次变革，包括大队³⁰、大宁乡³¹、管理区³²、大宁村委会³³、大宁社区居委会³⁴等形式。时至今日，大宁村设立了多个职能部门，包括行政办、宣教办、集体资产交易办、财务办、城建办、加工办、城管办、安全办、治保会、劳动调解办等。其中，劳动调解办和治保会与新莞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尤其是治保会，成为许多新莞人常提到的一个机构。治保会除了维持村内治安与日常秩序，还对居住在村内出租房内的所有新莞人进行登记管理。不少在大宁居住了二十来年的新莞人，还经常提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治保会。³⁵在当时，治保会的人基本是本村人，进入治保会作为一种

²⁸ 虽然政府的文件已经称之为社区，但是政府工作人员、村干部、村民、新移民等都多称呼大宁为大宁村，因此后文也将以村称呼。

²⁹ 当时，浙江人在大宁主要从事鱼塘养殖，在鱼塘放养鸭子，很多人累积了创业的资金，后来自己开工厂等。

³⁰ 1968 年开始称为虎门公社大宁大队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

³¹ 1984 年称为虎门区大宁乡人民政府。

³² 1986 年称为虎门镇大宁管理区。

³³ 1998 年称为虎门镇大宁村民委员会。

³⁴ 2005 年称为虎门镇大宁社区居民委员会和虎门镇大宁股份经济联合社，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经济联合社三位一体。

³⁵ 一天晚上，笔者在大宁江门村的一户新莞人开的小店门口和他们聊天，其中有个三十多岁的四川人说到当时他和同伴从外面过来大宁玩，因为是半夜了，结果在路上被治保会的人抓去审问，最后还是由亲戚交钱来才放回去。开小店的黄叔说起那时候的情况。那时候，治保会的人经常查暂住证，抓到没有的要抓去治保会，让熟人来交钱。黄叔曾在九十年代被抓过一次，在治保会过了一晚，由同乡交了 50 元给治保会，才放出来。治保会的人常常半夜三点到五点查房。他们直接敲门，十分粗暴。黄叔家那时他们的儿子还小，不过很懂事，他们让他别哭，他就不哭，不然就被治保会的来查房了。他们两夫妇之前没有办结婚证，2003 年才办理结婚证。有一次，他们锁着门，刚好黄叔需要外出做事，只好从窗子爬出去，怕从大门出被治保会的人抓到没有暂住证，当时十二月份了，他们不想一个月就要用办一年的钱来办暂住证。

权力的象征，在地位上高于外来人口。³⁶虽然治保会的职责是负责维持村内治安，但是一旦本地人与外地人发生矛盾纠纷，治保会往往会偏袒本村村民。³⁷目前，大宁治保会设有户管组等机构，负责新莞人的服务和管理工作。虽然按照政府和村里的要求，需要对出租屋的租客进行登记管理，但是由于数量庞大、人口流动性强等原因，该项工作难以完全落到实处。时至今日，还经常看到治保会的辅警、治安员、便衣等在村内巡逻。³⁸

事实上，具体哪一年开始有外地人进入大宁打工，村民都说记不清楚了。不过，从村里的历史资料和村民的回忆来看，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八十年代末，在大宁的外地人主要来自广东省山区农村和广西地区。³⁹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大宁的外来人口已经达到了几万的规模，特别是大宁开发了大板地工业区后，整个大板地工业区十分热闹。大宁南坊村村民潘叔，他在九十年代开过一段时间摩托载客，从大板地载客到大宁村⁴⁰，当时一个晚上都可以挣到几十块钱。在九十年代末，大宁已经在工业区建成了大宁广场，内有大宁剧院、图书馆、舞台等，生活在大宁的外来人口有了可以去娱乐休闲的好去处。根据笔者的了解，目前居住在大宁的新莞人数量并没有十年前多，在 2005 年左右是高峰期，居住在大宁长达 20 多年的人告诉笔者，“以前到处都可以看到人，特别是周末，市场都挤满了人，超市购物结账都要排很长的队伍，现在你去看华东购物超市，周末的人都很少。”但是，根据大宁村提供的数据和村干部的整体判断，两到三万的新莞人是比较准确的。

目前，居住在大宁的新莞人，除了一些相对短时间停留的年轻人外，还有大量整家人住在大宁的新莞人，他们大多数在大宁生活长达二十年。在本文，笔者所要关注的是体力型劳动者。从工作类型来看，他们多数在大宁村内各大小工厂打工，或者从事手工、清洁、保安、开个小店、管理出租屋等工作。从居住地来看，他们分布在大宁三个自然村六个村民小组，主要集中在大宁旧村和江门村。

³⁶ 在笔者所认识的新莞人中，有不少人是在大宁结婚、成家并且一直居住到现在，将近 20 来年。和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潜意识里还对当时外来人口所处的弱势地位所感到胆战心惊。

³⁷ 这种情况，在最近几年，已经好转，一方面与整个社会环境有关，另一方面，珠三角地区用工荒成为严峻的社会现实，“留住新莞人”成为村内诸多工厂企业头疼的大事。

³⁸ 时至今日，一些居住在大宁的新移民还对治保会的治安员持有不好的评价。2015 年 10 月的一个晚上，笔者与治保会的 Y 哥聊天，后他带着我在大宁村界四周逛逛，回来的时候他送我到江门村，当时与笔者交流甚多的黄叔、刘叔都表示惊讶，等 Y 哥走后，他们就说，“这些人就会欺负人，我们都怕他”。

³⁹ 按照村民的说法，是因为当时这些地方能够用粤语交流。

⁴⁰ 当时大板地工业区基本是工厂，超市、饭馆等消费场所很少，工人多到大宁旧村处购买生活用品、看电影等。

江门村原来是比较偏僻的村落，在近几年治安秩序得到了改善⁴¹，村民将宅基地都建成了新房子，每家每户都有好几栋房子用来出租。整个大宁，江门村的房租最便宜，因此近年来吸引了大量的新莞人入住江门村。居住的房屋类型主要包括村民的旧房子、2000年左右建的楼房和这几年新建的高层出租房⁴²。出租屋的租金，根据房屋新旧、面积大小以及地理位置等因素而不同。以江门村为例，在江门旧村的五层以下的旧房子，单间月租为130元左右。根据一些房东的说法，房屋出租率大概是七到八成。⁴³相比大宁其他村小组，江门村所建厂房较少，因而所剩下的地皮较多地用来自建出租屋，在笔者所认识的江门村村民中，每户至少都有三栋楼房用来出租。本文所要研究的城市新移民，主要是在江门村居住的普通体力型劳动者（即劳力型移民）。

三、小店经济——生计来源与社会互动

在本文中，笔者将关注点聚焦到江门村的小店，以个案的形式呈现小店里的日常生活与公共空间。这里所说的小店，是指分布在江门村不同出租屋一楼的小型商店。根据笔者的调查，几乎每条巷子都有一家小店。在二十平米左右的小店空间，各种日常用品陈列其中，晚上店主一家则在后面隔出来的地方休息。店内的商品主要是水、香烟、啤酒以及各种零食。小店內少不了的硬件设施则是一台电视，哪怕是一部陈旧的电视机，也会伴随着小店开门就一直播放。为了节省空间，小店老板一般都会购买体积小的电视机，然后将放在货架的上方或者挂在墙壁上。而在小店门口，则摆放了一两张小桌子和若干塑料小凳子。店内空间虽小，但是往往门口都会有一个较大的空间，使得可以容纳十来个人同时驻足观看。有些小店会选择在店门口摆放一张麻将桌或者在小店旁边的屋子安置麻将桌，也有的在店内隔出单独的空间用来给人打麻将，这与小店自身的空间面积有关系。

小店，顾名思义就是空间不大、为顾客提供日常用品的地方。事实上，从商品种类来说，与大型超市相比，的确无法相提并论，但是“虽小却便捷”的优势，

⁴¹ 居住在江门村的新莞人和笔者提起2000年左右，江门村没有路灯，社会治安差，来村里的道路也是不好，经常有人偷东西，就是挂在屋外的衣服、鞋子都会被人偷走。

⁴² 比如，在大宁麒麟中路拔地而起的中鹏公寓，十几层高，占地面积大，全封闭式管理，楼下有门禁和保安看守，如果不是居住在里面的人，无法进入。另外，各村民小组内都有村民自己花几百万元建了十层左右的出租公寓，配有电梯等设施，出租价格会是普通出租房的约1.5倍。

⁴³ 近年来，大宁出租屋出租率有所下降，主要因素包括出租屋增多、工厂倒闭后工人离开大宁等因素，近几年房屋出租价格上浮很小，甚至有下降的现象。新建的十几层的出租公寓吸引了一些工资较高的新移民。

成为满足周边出租楼栋租客的日常生活需求。居住江门村新区前排的余阿姨⁴⁴，来自湖北，已经在江门村生活二十多年了。江门新区的这些房子都比较新，并且规划得较好，各栋房子之间的间距较大，采光好。余阿姨老公姓李，老公儿子女儿都在大宁工厂打工。她开间小店，卖烟、水、饮料等，还负责照看两个三岁的小女孩，是她的孙女和外甥女。白天他们上班后，她就一边看店，一边照看小孩，还帮房东管理楼上的出租房⁴⁵。她的家人晚上下班回来家里住，屋内放着做手工的材料，她在空余时间还做点手工，她说“做一袋才四毛钱，一天做不了多少，顶多几十袋，小孩子到处跑，一个人要看着这两个小孩，还要给他们喂饭”。她们家在一楼开店，二楼住人，据她说，房东是江门村村长，房东家有七八栋楼。她住这在这栋房子有十多年了。由于靠近江门村村口的大型超市——比如爱心生活超市、艺龙超市等以及各种百货商店，她家小店的顾客并不多，基本上都是她所负责管理的出租房的租客。这些租客一般会下来买水或者啤酒、香烟。店内摆放着一张麻将桌，但是平时很少人来打麻将。虽然每日的销售量很小，但是已经足够争取每月的月租和补贴一家的生活费。

而笔者接下来要重点描述的则是在江门旧村的一家小店。小店的老板是来自梅州大浦县的客家人黄叔。这家小店大约 25 平米，黄叔一家在旁边所隔开的房间作息，厨具则放在小店背后用货架所隔开的狭窄空间内。⁴⁶黄叔和妻子何阿姨在江门村已经生活了二十来年，在目前这栋房子都已经住了十多年了。他们育有一子，今年刚刚考上广州的重点大学。小孩是在大宁度过童年时光，读完小学后再回去老家梅州大浦县继续读初中。正如前文所描述的一样，货架上除了摆放商品外，还放着一个陈旧的电视机，一些商品没有地方放，都摆到门口门边的空地上。旁边的小屋则专门租来给居住在周边的外地人聚在一起打麻将。⁴⁷在小店的

⁴⁴该店位于江门新区一巷，当时笔者通过购买水来和老板娘聊起来。到这种小店聊天，如果一直坐在那里不买东西，是过意不去的，毕竟多少会打扰别人。同时，买东西也可以拉近双方之间的关系。

⁴⁵在大宁，不少村民出租房屋，但自己却不管理，而是由居住在这栋楼房的人兼职管理，村民通过免费提供一间租房或者优惠租房的形式，由所挑选的新移民负责管理，每月收取房租、水电费以及处理租客的日常问题等。

⁴⁶这栋房子的房东家儿子在镇上工作，就一家人到了那里买房子，家里的房子出租出去，由黄叔家帮忙收租，作为回报，就将中间的小平房免费提供给他们家住。当时他们过来江门村帮房东家装修，然后房东觉得他人还比较可靠，就将这前后两栋楼房交给他们来管理，平时每月房东会从镇上回来一次。因此，他们在这里住了十来年了，两夫妻也没有做固定的工作，而是看这间小店和做维修工，同时帮忙收房租，一共两栋房子，上下各一栋，上面这一栋是单间，下面这一栋则是套间，有两三家人在里面住。

⁴⁷笔者在这里，并没有严格区分小店的地理空间，而是将小店内外部以及旁边的麻将屋作为小店的一个整体。原因有二，一是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同时都是由黄叔老婆一人看管；二是店内的商品几乎是与麻将连成一体，店内的饮料、香烟一大部分是靠打麻将的时候消耗。

门口，则将铁皮盖住上方，防治下雨或者太阳暴晒，与小店内部空间连接起来，下面则摆放一张塑料桌子和七八张塑料椅子及小矮凳。每天早上九点钟，何阿姨则起来开门，开始一天的营业时间。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何阿姨都负责在家里看店。而黄叔则到大宁村及其附近的村里接工作，他主要是自己做一些电工、维修的零活。

根据笔者的观察和统计，每天来店里买东西的人主要有两类，一是居住在黄叔家所管理的出租屋楼上的三层租客，共四十个房间，住了五十人左右，二是在周边的三栋楼房的租客。一些在工厂打工的年轻人或者中年男子，下午或者晚上下班后会进店里买一瓶啤酒拿回出租房里喝。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有些人则下来边看电视边喝啤酒或者买零食吃。和笔者相识结为好友的袁叔，从贵州毕节人，来大宁有好几年了，平时喜欢喝啤酒，下班后与朋友或者一起在厂里打工的人到外面喝啤酒，或者一个人回到小店里买啤酒喝。好几次，他还请我和他一起在门口喝啤酒，他说他喜欢各种年龄段的朋友。

他在大宁换了几次工作。开始在一家电子厂做，因为与主管发生矛盾，就离开了，去过圆通做过几个月的临时工，后来去了一家生产包装纸箱（如蛋糕盒）的厂，差不多两年了。他老婆比他早出来两年，在大宁丽声钟工厂做了七八年，今年带着两个儿子回去家里了，一方面让小儿子好好读书，另一方面回去建房子，在镇上有一栋一层的房子出租了，现在回去都没有地方住，就在上面加两层，在原来的看房子拆了建三层需要五十多万。他大儿子 18 岁，没有怎么读书，到处玩。他们一家之前在旁边的两层旧楼租房子住，两百三一个月，可以放三铺床，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在这里，就退了房子，来何阿姨管理的出租房租了一个单间，130 元一个月。（田野笔记：20150815）

在小店商品的销售量中，打麻将的人贡献了很大一部分。因为工厂上班时间不同，有些人是周末休息，有些人是周一到周五轮休，有些人上白班，而有些人则上夜班。所以基本上每天都有人过来打麻将。打麻将，四小时为一个计费单位，需要交 60 元左右。小店则需要每人免费提供一瓶水。事实上，在打麻将的过程中，打麻将的人会不断地向小店购买红牛、零食等，这正也是何阿姨这么热衷邀请大家来打麻将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一次，有两个在里面何阿姨管理的出租房租房的二十多岁小伙子在门口坐着吃面条，老板娘叫他们一起开台打麻将。“高个

子”⁴⁸说没钱了，吃完面就走了，又来了一个，也不够人，于是老板娘打电话叫人，但叫了几个都来不了，她又上楼叫一个名为“胖子”——刘军⁴⁹的人。大约十分钟后，他下来了，说要去开工，可是老板娘怂恿一下，他们就开台了。刘军进去打麻将时，还从店里买了一包香烟。笔者曾问过何阿姨的儿子，为什么他们这几个人那么喜欢打麻将。他说，这小店就得靠打麻将，除了台费，重要的还是打麻将的人买东西，如购买烟酒。“不打麻将，这个小店能卖多少东西，你看附近，都很多人在打麻将”。

从小店的日常运作过程来看，居住在这里的新移民对小店商品的购买使得小店能够维持下去。除了销售商品，满足新移民的生活所需外，还以“台费”等形式提供麻将桌，供新移民工作之余消遣所用。对于何阿姨一家来说，成天花在看店、服务来打麻将的新移民等的时间成本换来售卖商品的利润和新移民提供的“台费”，意味着商品的售卖和“台费”收入成为一家人生活开支等费用的来源。从这一点来看，小店作为一种经济来源，这种经济来源是维系小店作为一种网络、公共空间的基础。

在小店里，不仅只有商品的销售以及麻将活动，“一起看电视”成为小店周围几栋楼房租客的共同活动。黄叔家小店的电视机自早上九点小店开门就开始播放，一直到晚上十二点小店关门才关闭。⁵⁰在这期间，有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间段过来看电视。白天主要是妇女带着小孩过来，有些是年轻妈妈带着小孩，有些则是中年妇女带着自己的孙子或者孙女。人多的时候，聚集了十来个妇女在这里看电视。在隔壁楼栋住的彭姐，三十五岁左右，来自陕西，她没有工作，在家照看她的小孩，丈夫则自己接单做小生意，请了一个工人帮忙。而住在旁边一栋二层旧楼房的河南阿姨，则每天带她的孙女过来，她一家人都在大宁工作，儿子儿媳妇在工厂打工，丈夫则做环卫工，每天负责打扫江门村的卫生。当他们坐在小店门口，就开始边看电视，边说自家的事情。她们对各自家的事情了如指掌，家人做什么工作、在这里居住多久了、谁家生了小孩、谁又换了工作等等，她们

⁴⁸ 在这个社区，全名成为不重要的内容，即使何阿姨负责管理整栋楼，但她记不住这些人的全名，虽然平时天天见面说话。他们之间或者知道姓氏，或者通过外形特点来作为一个人的识别特征，比如“高个子”，则表示这个人身高在这里属于较高。

⁴⁹ 四川人，很小就生活在东莞，他的父亲是在大宁做环卫工。

⁵⁰ 即使晚上没有人打麻将，他们家也会坚持到十二点才关门，主要是因为考虑到有些在工厂打工的人很晚下班回来，要买东西的话没有地方可去，外面的超市一般都已经早早关门了。另外，也是看管出租房的需要。有时候，因为打麻将的人超时了，他们也不会去说，也会“等到他们玩到不想玩了才关门”。

都清清楚楚。除了聊各自家里的事情，她们还会聊起以前刚到大宁江门村时的情形。⁵¹ 另外，买菜则成为她们谈论的一个重要话题。何阿姨去了大宁果粒来市场，碰上了廉价、实惠的菜价，她回来便会和她们分享。哪家超市在晚上打折清货，她们也会相互告知。

到了晚上，小店门口主要聚集男人，他们会选择看一些武打电视剧、抗日剧等。此时，黄叔一般都已经从外面做零工回来了，他经常会坐在门口，泡一壶茶，和过来看电视的男人们喝茶聊天。聊天内容包括正在播放的电视剧剧情、白天出去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等等。而何阿姨则主要和其他人一起打麻将或者看他们打，给他们提供水、零食等服务。黄叔经常叫笔者过去一起泡茶喝，和笔者讲述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作为一个年轻小伙子从家里梅州出来打工“闯世界”的辛酸史。每天晚上，来自河源客家地区的刘叔则会在晚饭后过来看电视。刘叔四十多岁，在大宁开摩托车载客，白天都出去，只有晚上才有时间过来看电视。他一个人在隔壁的一栋出租房租了一个单间，已经在这里住了好些年了。

正如前文所说，小店也是一个新移民社区互动的场所。不论是打麻将的人，还是过来看电视，他们都会互相分享各自家里的事情、工作的情况以及电视剧的内容，在这种分享过程中，城市里的“陌生人”转变为“熟人”。因此，作为经济场域的小店，也成为了新移民社会互动的公共场所。讨论、分享、互动在这里发生，新的社区关系悄然生成。

四、从亲缘到业缘——社会网络的拓展

不少研究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切入，探讨亲缘、地缘等社会网络如何在移民过程中发挥作用。⁵² 具有乡土性的农村社会，血缘、地缘和亲缘的网络维系着生活在农村社区的个体及家庭的延续与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力型新移民，不论是

⁵¹ 笔者饭后或者不出去访谈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她们旁边听她们谈论。从一开始的“陌生人”变成了她们的“熟人”，笔者的出现已经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⁵² 如李培林的研究指出，中国的乡土社会是特别重视以家庭为纽带的亲缘和地缘关系的，这种对亲缘、地缘关系的重视，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成为一种“习性”，并具有很大的惯性，这种“习性”没有因生活地点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动或职业由农民到工人的变动而改变，也没有因拥有了一定的工商业生产资本，成了雇用他人的业主而改变李培林，流动民工的这种“亲缘关系网络”的作用贯穿于民工的流动、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参见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又如项飚等人对浙江村的研究指出，浙江农村工商业者以经营为目的的流动，通常都结成小群体，这种群体依托于传统的人际网络，像在单纯的劳动力流动中一样，这种小群体发挥着保障安全、降低流动中的心理成本、在生活上互助的功能，小群体不仅是出于安全和生活上相互帮助的需要，而且也是生产经营上协作、分工的需要，这种情况在早期的小规模流动中就已出现了。参见：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项飚：《“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刚来大宁打工，还是经过二十多年以后的工作以及社区生活，亲缘、地缘等社会网络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下文将以个案的形式探讨亲缘、地缘是如何带动新移民的打工生活，并指出随着亲缘、地缘关系的拓展，对新移民的认同则使得社会网络的延伸与社区共同体认同的强化。

在笔者所接触的体力型新移民中，他们来自不同省份，在大宁从事不同的工作，其中有一部分的人已经在大宁居住时间超过 20 年。他们向笔者谈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刚来大宁打工的情形，当问及“为什么会来大宁打工呢”的问题时，他们几乎都会说到是亲人或者是村里人的带动，“那时候我有亲戚在大宁这里打工，回去叫我出来的”。前面提及的小店店主何阿姨便是由她亲戚带出来大宁的。

她 1974 年出生，小她老公五六岁。1990 年左右，初二没读完就跟着村里的堂姐出来打工，当时到南海，那里的条件十分艰苦，用的井水水土不服，吃得也差，一个月没做到没拿到工资就回家了。当时坐车到广州，开始以为五毛钱坐火车去南海很近，就走路，结果走了很久。第二年又跟着堂姐他们跑到大宁，在富士高打工两年，要工作两年才退押金一百多块钱。两年后，出来做，后来又进去做了两年，认识了老公，在同一车间。两年后，又出来了，跟着老公去了深圳等，当时老公搞装修，她就做工厂。1996 年，生了孩子，1998 年左右，回到大宁，在一家快餐店做到 2004 年，后来这里店倒闭了，当时很挣钱，一天可以营业一万多了，店里有五个员工，就在现在华东超市附近，以前都是大排档，现在都变成卖手机的地方了。（田野笔记：20151102）

何阿姨的丈夫黄叔，在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跟着家里的亲戚跑出来打工，去过潮汕地区、东莞、深圳等地。按照他们的说法，当时条件十分艰苦，出到外面，还要办暂住证，担心抢劫等。黄叔在大宁富士高工厂做时，一个月拿到一两百块钱，刚开始的一个月，都要向先出来的亲戚借钱。“那时候自己不熟悉，哪都不敢去，工厂放假的时候，都是跑去找亲戚玩。”⁵³

当这些新移民进入城市，打工生活往往成为他们主要的选择。离开熟悉的村庄，进入陌生的环境，他们往往借助地缘关系来重构新的生活秩序。“老乡”一

⁵³ 类似的个案很多。比如，在大宁居委会工作的广西人陈姐，90 年初中才十五岁毕业就出来了，妈妈重男轻女，让她不要读了，她有一个哥哥和弟弟。在 90 年七八月份，她就从家里跟着在村里隔壁家的同学的哥哥跑出来打工，没有和父母要钱，偷偷跑出来的。没有干活时，就跑去找她姐姐。开始在北棚手袋厂做，四块五一天。因为厂里有人骚扰，就辞职了。后来在大宁的一家电子厂做了三四个月，从生产线员工做到办公室文员，大约在 1992 年的时候，因为大宁社区搞运动会，她为厂里负责举牌的领队。当时的大宁书记陈书记刚好需要招人接电话，就和厂里说需要招她过去。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已经在大宁社区工作了 23。

词与“家”类似，具有较强伸缩性，对于来自广东以外省份的新移民来说，“同省”、“同市”、“同县”都可以成为老乡，而来自广东的新移民，则比较看重是同一个方言系统的人视为老乡，如来自梅州的黄叔会将来自河源的刘叔视为老乡，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客家方言区的客家人。前文所提到的袁哥，他喜欢喝啤酒，从工厂下班后，都会约上几个贵州老乡去喝啤酒。他在工厂打工，玩得最好的工友还是他的贵州老乡。黄叔没有去工厂打工，他白天出去做零工，除了有人直接请他去修水管或者装电线外，他主要是跟着他同镇的名叫辉龙的老乡一起干活，这个老乡负责接活，然后请他去帮忙。

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新移民社区中，亲缘、地缘关系仍旧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在大宁，不像“浙江村”⁵⁴、“新疆村”⁵⁵等，并没有形成某一地域群体聚居地，而是形成了多元群体混居的格局。小店作为这种社区的一个社区空间，新移民的社会互动、共享与交流在这里形成。在这里，大家都共享一个身份——“我们都是打工的人”，成为他们聚居在同一个地方的共同身份认同。以前面提及到的黄叔家开的小店为例。周边几栋出租房所居住的新移民，他们抱着小孩过来小店门口看电视。黄叔的老婆何阿姨则会经常关心小孩子的情况，有时候他们没有时间带小孩，都会把小孩放在小店门口，让何阿姨帮忙看着。有时候年轻的妈妈比较缺乏带小孩的经验，何阿姨及其他年纪大的中年妇女则会告诉这些年轻妈妈要注意的事情。⁵⁶除了互相关心小孩，还体现在关心年轻的新移民。有对刚来这边租住的小情侣，男的是云南的，平时在工厂打工，也不怎么认真，经常去上网，还与别的女人开房，女孩来自茂名，今年十八岁，这几个月没有工作，为了省钱，经常不吃饭。⁵⁷后来，在何阿姨的建议下，她从外面买回了电饭锅、面、米等，要自己煲粥喝。每到吃饭时间，这个女孩经过小店门口，何阿姨都会邀请她一起吃饭。另外，从笔者的观察来看，在这以小店为核心的新移民社区，新型的“熟人社会”在酝酿。来小店买东西，有时候没带钱，何阿姨就让他们下次再给，打麻将的人没有钱打牌或者交不起房租，则向何阿姨借钱。

⁵⁴ 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⁵⁵ 杨圣敏和王汉生对北京新疆村的系列调查，参见杨圣敏、王汉生：《北京“新疆村”的变迁——北京“新疆村”调查之一》，《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大城市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与演变——北京新疆村调查之二》，《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

⁵⁶ 有一次，笔者在现场，来自四川的二十出头的年轻妈妈抱着发烧感冒的儿子在向何阿姨等人了解经验。何阿姨告诉她，天气热不能给小孩穿太多，否则出汗都会让小孩子着凉感冒了。

⁵⁷ 何阿姨和笔者说起这样的情况，都十分心疼这个女孩，觉得她这么傻，家里人肯定担心得很。

甚至何阿姨不在店里，他们直接进去拿了东西，下次再告诉她。⁵⁸从这些情况来看，来自不同地方的新移民在大宁村构建了新的社区关系，新的“熟人关系”逐渐生成并且成为维系新移民群体日常生活的纽带。

五、门口议事——作为公共空间的小店

公共空间，不仅是地理学、建筑学的重要概念，还是社会科学所关注的重点。社会空间问题，正在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成为研究社会的一种新的理论视角。⁵⁹ 张静采用 J. Habermas 的用法（the public sphere）——公共空间首先指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在该领域中，人们能够形成某种类似于公共舆论的东西，凡是公民都享有参与该领域之活动的充分保障，他以上海社区纠纷案为例，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社会基础进行了探讨分析。⁶⁰项飚在对“浙江村”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流动人口形成了“新社会空间”。⁶¹实际上，小店还是劳力型新移民生活的公共空间。下文将从社区里发生的一件事件为例进行阐述。

2015 年 7 月的某天，笔者路过莱得利工厂前面，见工厂门口一群人在站着，保安、治保会的治安员都在旁边，工厂大门紧闭，顿感好奇。回到江门村，见到何阿姨在小店门口，还有五六个人在门口坐着讲话。不一会，就听到他们谈起莱得利工厂刚刚发生的跳楼事件。⁶²跳楼的妇女 50 来岁，已经在莱得利工作了十多年，工厂近期搬迁到别的的地方，这个妇女与其他工友一样，不愿意跟着工厂过去，但又听说没有补偿。在前段时间，因为有亲戚去世，她请假回去，返回来工厂后，表现失常，工厂安排保安看管，后趁着保安不注意，她跑到楼顶，突然从上面摔下来身亡。这两天她的家人过来，要工厂赔偿。一起在小店门口谈论此事的有两位是同在莱得利打工的湖南老乡。一个男性老乡越说越气愤，坚持说要工厂赔偿一百万，而旁边的另一个女性老乡则说：“肯定不会给 100 万，能赔个 10 多万都差不多了，虽然我和她一个厂的，也是老乡，但是是她自己跑上去掉下来

⁵⁸ 笔者在的大宁谭氏祠堂旁边的一个小店也注意到类似的情况。来自湖南的小店老板，在大宁小学旧址（村里将旧址拆了，改建成楼房出租，里面住了几十户外地人）开了一家小店，他在店里面的房间打麻将时，住在这里的人则进来直接拿了饮料就走，有些则直接和老板喊一声就走了。

⁵⁹ 潘泽泉：《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社会空间转向》，《江苏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 期。

⁶⁰ 张静：《培育城市公共空间的社会基础——以一起上海社区纠纷案为例》，《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06 年第 2 期。

⁶¹ 他认为形成“新社会空间”的原因有二，一是不能为宏观体制所接纳的流动人口，在体制外积极进行微观层次上的规则创新，二是“传统网络的市场化”。参见项飚：《传统与新社会空间的生成——一个中国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历史》，《战略与管理》1996 年第 6 期。

⁶² 地方媒体有相关的报导，虎门镇政府也对该事件进行了通报确认。可参见：《虎门一女工从宿舍楼顶坠亡 事发前刚奔丧返回工厂》，来源：<http://news.timedg.com/2015-07/23/20181225.shtml>。2015 年 11 月 3 日访问。

的。”旁边的其他几个人也开始议论起来。这两天，整个厂已经停工，在厂里打工的人都放假。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小店门口都会谈论起这件事情，这件事也成为了这段时期内社区的公共事件，虽然很难会凝聚成完全一致的利益共同体向工厂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但是关注、谈论等已经表明，小店作为一个公共空间，促使了社区不同的人聚在一起交流、讨论，甚至达成共识。在 2015 年 10 月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发布，公报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⁶³小店的电视新闻成为这一消息的传递者，大家看到电视新闻播放了这条消息后，开始讨论起来。有的人说到了 2000 年左右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有的人则说“现在给自己生，也养不起，在这里读书太贵了”。

社区公共意识是社会群体及个人对“社区”这一与人们生活关系日益密切的事物在心理上的自觉感受与认同。⁶⁴吴毅在对白鹤村村民公共参与和公共意识的分析中指出，村庄精英和普通村民是两个基本的观照面相。⁶⁵而当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群聚在一起生活，原有的社区将会发生过变化，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社会文化。在这新移民形成的社区里，将会形成怎样的公共意识？笔者认为，小店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首先，它给租住在周边出租房的新移民提供了公共的活动场合。出租屋，尤其是价格低廉的出租屋，空间狭小，并且环境较差，每栋出租房里一般都没有一个提供给居住人的共同活动空间。而小店的空间，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其次，小店提供的电视，成为大家工作之余进行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来源。在这里租房住的人，不少人是没有自行购买电视，有些人即使购买了电视，也乐意到小店与大家一起观看。再次，不同的人聚在小店，或是打麻将，或者看电视，或者谈论社区或者国家的事情，关注个人之外的世界与社会。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内，城市新移民的公共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

六、讨论与结语：迈向移民城市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宁从一个普通的珠三角村落发展为一个具有城市社区特点的都市村落。⁶⁶尽管大宁自身的史便是一部移民史，盐场、码头等地理特点，

⁶³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全文）》，来源：http://www.caixin.com/2015-10-29/100867990_all.html#page2，2015 年 11 月 3 日访问。

⁶⁴ 刘厚金：《社区公共意识的培育及路径选择——以上海某社区为例》，《理论探索》2007 年第 1 期。

⁶⁵ 吴毅：《村治中的政治人——一个村庄村民公共参与和公共意识的分析》，《战略与管理》1998 年第 1 期。

⁶⁶ 这样的村落与一般的乡村不同，其具有发达的工业，便捷的交通与完善的基础设施，又具有都市的生活

历来就有诸多族群的人在这里聚集、繁衍生息。原本几大姓氏从大宁迁出，谭氏族人从江西经粤北进入大宁，并经过不断地繁衍生息，成为当下大宁第一大姓氏。⁶⁷根据村民的说法，在解放前，大宁种植大量的水草，其中有一些陈姓的人从厚街过来这里教大宁人编制水草，是今日大宁一些陈氏村民的来源。⁶⁸尽管如此，但是大量的外地人涌入大宁，进入工厂打工，形成了今日十倍于本地村民的新移民现状，还是最近三十多年的事情。经过三十多年的乡村都市化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正进入移民社会。虎门历来具有多元族群共生、共存与共融的文化根基，广府人、客家人、水上居民等生活在这里，多元族群共存的历史成为虎门具有很强的社会包容性的文化、历史根基。

在大宁，乡村都市化的发展带来了大量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城市新移民，从一个相对封闭、单一、固定的乡村社区转变为一个开放的、多元的、流动的移民社区。那么，这类的社区是怎样得以再造？笔者认为，社区再造不是传统的回归，而是传统与现代、多元族群共存的新型社区建设。小店作为一个平台或者媒介空间，通过老乡、外地人、同楼栋的租客等社会符号将大家联系起来，这种社会网络借助麻将、购买小店商品等，保持了小店的运转，而小店老板也以热情的服务对待各位租客，并提供了休闲、谈话的公共空间，如电视、无线网络等。虽然这是非正式的关系，但成为了这些外地人在移民社区构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节点。另外，小店老板也因为通过帮忙管理出租房，如代收房租、登记出租等，获得了房东的免费的住房与小店空间。不论是本地人还是新移民，都生活在这个互相作用的社区网络中。⁶⁹从前面所描述的来看，由小店为中心的移民社区正逐渐形成一个社区共同体，这可能是我国从地域性社会向移民性社会转型的一种形式。

从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大宁村有不少新移民已经在大宁居住了长达二十年，他们从十多岁出来大宁打工，到结婚成家、生子，再到小孩长大甚至结婚成

方式特点，但它又与大都市里的城中村不同，城中村一般处在大都市包围圈中，社会环境较差，与周边的城市建设不协调，并且可能将会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而消失。笔者在这里称之为村，是因为考虑到大宁人、新移民都依旧称之为大宁村。

⁶⁷ 大宁现有二十多个姓氏，各个姓氏的来源复杂，其中人数较多的姓氏包括谭、张、梁、苏等姓氏。

⁶⁸ 事实上，北坊村有几家陈氏村民就是这种情况，如大宁原村支书家。

⁶⁹ 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时至今日，外地人与本地人的关系还是比较微妙的。从以下的一个事例可以了解。在 2015 年 9 月，来自贵州的袁叔说叫他的老乡从隔壁另一个房东的出租房搬到何阿姨所管理的出租房，当时刚好这里有好一间刚空出来的房间，但是何阿姨就严肃地和他说，“千万不能搬过来，否则得罪了之前的房东，我们是外地人，要在这里常住开小店的，到时候自找麻烦了，就没法过日子了，还不如像现在一样，双方不得罪，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家，这一个家庭的延续与人口再生产都在大宁完成。按照现有的制度体系，他们依旧无法与本村人一样享受社区的福利⁷⁰，从这一点上来说，能否真正扎根社区，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与研究。“社会融合”，是指在相同的条件（比如制度环境、经济环境等）下，相同背景（比如教育）的城市新移民与本地居民有同等的机会，获得同一待遇水平的职业、进入同一层次的社会结构；社会融合包括经济融合和结构融合。⁷¹对照大宁的现实情况，尽管小店发挥了经济、网络与公共空间的作用，劳力型新移民正形成新型的移民社区，但是真正、完全的社会融合还任重而道远。从大宁的个案来看，出租屋社区的小店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交换与生计来源，还是社区的公共空间，社区互动在这里发生，社区网络得到延伸，社区共同体得以形成。城市新移民的社会网络不再局限于亲缘关系，不同地域群体在这一公共空间进行互动与生存。随着新型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迈向移民城市已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城市新移民社区将会进一步形成、延续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 阿兰纳·伯兰德、朱健刚：《公众参与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对绿色社区建设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 [2] 陈映芳：《关注城市新移民》，《解放日报》2004-08-22。
- [3] 《广东省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1979-2000）·第1卷》，北京：方志出版社，2014年，第24页。
- [4] 东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东莞市志（1979-2000）》，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6页。《东莞市统计年鉴2014》，来源：
<http://www.gd-info.gov.cn/books/dtree/showbook.jsp?stype=v&paths=20291&siteid=dg&sitename=东莞市地情网>，2015年11月2日访问。
- [5] 《虎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虎门年鉴2014》，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⁷⁰ 包括每年的村、小组两级分红，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老人生态金等。以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为例，不算他个人物业等收入，普通老人每月可以从居委会拿到300补贴，加上农村养老，每个月有1500左右，加上每年的分红，每个老人一个月可以拿到3000块。（与大宁集体资产交易办谭志雄访谈笔记，20151029）

⁷¹ 周大鸣、杨小柳：《从农民工到城市新移民：一个概念、一种思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年, 第 255 页。

- [6] 景志铮、郭虹:《城市新移民的社区融入与社会排斥——成都市社区个案研究》,《西北人口》2007 年第 2 期。
- [7] 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 年第 4 期。
- [8] 李志刚、刘晔:《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网络语空间分异》,《地理学报》2011 年第 6 期。
- [9] 刘厚金:《社区公共意识的培育及路径选择——以上海某社区为例》,《理论探索》2007 年第 1 期。
- [10] 潘泽泉:《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社会空间转向》,《江苏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 期。
- [11] 苏昕:《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新移民社会权利保障》,《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 年第 2 期。
- [12] 童星、马西恒:《“敦睦他者”与“化整为零”——城市新移民的社区融合》,《社会学研究》, 2008 年第 1 期。
- [13] 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项飚:《“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社会学研究》1997 年第 1 期。
- [14] 文军:《论我国城市劳动力新移民的系统构成及其行为选择》,《南京社会科学》2005 年第 1 期。
- [15] 吴毅:《村治中的政治人——一个村庄村民公共参与和公共意识的分析》,《战略与管理》1998 年第 1 期。
- [16] 武晓黎:《关注城市新移民》,《党政干部文摘》2000 年 01 期。
- [17] 项飚:《传统与新社会空间的生成——一个中国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历史》,《战略与管理》1996 年第 6 期。
- [18] 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19] 杨圣敏、王汉生:《北京“新疆村”的变迁——北京“新疆村”调查之一》,《西北民族研究》2008 年第 2 期。
- [20] 杨圣敏、王汉生:《大城市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与演变——北京新疆村调查之二》,《西北民族研究》2008 年第 3 期。
- [21] 张静:《培育城市公共空间的社会基础——一起上海社区纠纷案为例》,《上

海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 [22]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袁长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 [23]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 [24]周大鸣、刘玉萍:《社会关系网络与农民工投资型输出——以佛山“攸县人”挖机经济为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 [25]周大鸣、杨小柳:《从农民工到城市新移民:一个概念、一种思路》,《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 [26]朱力:《赋予城市新移民平等发展机会》,《南京日报》2006-01-26。